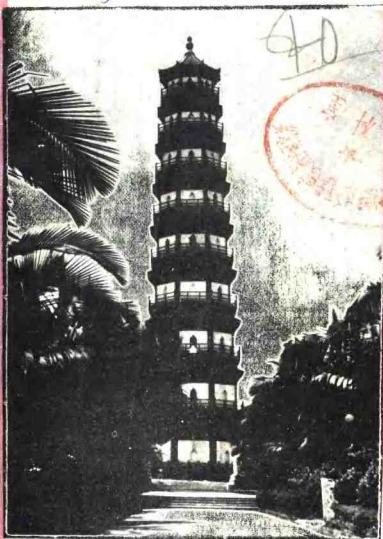


19.78

4.0



海康文史

1
1989

(总第十一册)

广东省海康县政协文史组编

一九八九年第一期
(总第十一期)

目 录

一九八九年六月

抗日战争时期雷师建党工作的回忆.....	肖汉辉 (1)
王文劭、曾锡驹创办“模范小学”纪实.....	何舜琴 何佩钧 (5)
我这一家.....	何佩瑶 何福林 何福赐 何妃勤 何佩均 (7)
南渡口上 阻击残敌.....	黄 琦 (9)
吴林生平.....	洪 元 (10)
陈乔森事迹纪略.....	容 深 (13)
鲜为人知的农民画家陈鹤年.....	符秉孟 (24)
海国巾帼志.....	邓 柏 (25)
海康，有过一颗老大的缅茄树.....	黄 德 (32)
雷州蒲草及蒲织品发展综述.....	李 龙 (33)
海康草药的分布与应用.....	潘源文 (35)
关于《漫话海康番薯》一文几点质疑.....	罗 祥 (40)
海康足球运动史料.....	吴 流 (41)
雷剧的剧目问题.....	黎也松 (45)
雷剧志 (传记部份).....	詹南生 (50)
最近发现的三座南宋纪年墓.....	邓杰昌 (52)
精巧别致的陶瓷棺在我县面世.....	余 石 (54)
求是之话.....	宋 锐 (55)
“徐闻”得名考.....	(55)
雷州得名于“雷水”.....	(58)
擎雷水不是南渡河.....	(60)
封面照片——古塔新姿.....	康仁近摄

抗日战争时期雷师建党工作回忆

纪念雷师建党五十周年

肖汉辉

中国共产党雷师学生党支部自一九三九年六月建立,至今已五十周年了。它是雷师地下党第一个党支部,也是海康党组织从一九二八年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破坏了十一年后重新建立起来的第一个党支部。它的建立与发展,为后来领导海康人民从事抗日与解放斗争事业作出了贡献。

雷师是雷州半岛的最高学府

雷师是广东省立雷州师范学校的简称,它的前身是广东省立第十中学校,校址原设在海康县城内广朝南路(即现在海康县人民政府所在地)。在十中时期,学校设有高中师范、初中各三个班,一九三五年的下半年省教育厅为了培养师范人材,将省立十中改为师范学校,厅长黄麟书来海康视察时,还亲为雷师题写校名。当时在改校的做法和步骤上是比较稳妥的。一九三五年下半年,先将一九三四年下半年招收的普通高中一年级那个班相应地改为高中师范二年级;再从这一年的秋季起,高中改招高中师范班新生;初中三个班当时还未改,还招考最后一届(第十七届)初中班新生(我就是考上第十七届初中班的)。初中班是从一九三七年夏起,每届毕业后才逐年改为招收四年制简易师范班学生。一九三二年秋起十中已设立附属高级小学校五、六年级两个班,到一九三八年下半年雷师迁校前,全校便设有高中师范三个班、简易师范三个班、附小二个班,共有八个班,全校师生员工共有四百多人。在当时,它是雷州三县所有中等学校规模较大、教学设备较好、并设有高师和简师培养师范人材的省立学校。远近青年学生慕名而来投考雷师的特多,它不愧是雷州半岛的最高学府。

雷师建党的思想基础

雷师建党工作不是偶然的,是有它的思想基础的。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帝国主义在芦沟桥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妄图一口吞并中国,激起了全国人民同仇敌忾,共同抗日。这时,正在雷师高师班读书的王文砣和在初中第十七班(初中二年级)读书的肖汉辉、唐勤、唐庆时等十多位同学,便利用暑假期间组织宣传队,深入城乡各地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工作。到了一九三八年四月,雷师学生更和海康一些青年共同发起组织“海康县青年抗敌同志会”(下简称为青抗会),雷师当时有二百多学生参加了青抗会。在七、八月间,王文砣、唐勤、唐庆时、肖汉辉、邓其敏、唐庆远等数人又参加青抗会组织的雷州歌剧团下乡一个月,演出抗日救国的雷州歌剧。通过这些抗日宣传活动,我们加深了对祖国的热爱,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罪行的仇恨。一九三七年冬,邓其敏、唐勤、唐庆时、黄其炜、肖汉辉等十多位同学还参

加了高师班的邓麟彰、莫怀、陈兆荣、王文衡等组织的雷师学生读书会。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先后阅读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和上海“左联”的一些进步书籍。后来又订阅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以及购买毛主席的《论持久战》、《新阶段》等论著和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战争等书刊。大家在读书会中，共同探讨抗日救国的真理，使我们对于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有了初步认识。当时，我们在思想上已向往共产党。有了这一思想基础，所以后来我们一接触到地下党员时，很快就被吸收参加党的组织。

雷师迁校给建党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一九三八年夏，我们初中十七班的同学毕业了。秋季，唐勤、唐庆时、邓其敏、丁起翥、黄其炜、周济平、肖汉辉等接着又考上雷师高中师范班读书。这时，由于蒋介石的消极抗日政策造成中国半壁河山沦于敌手，南京蒋介石政府也早已迁都重庆，沦陷区人民惨遭敌人屠杀。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部队八路军、新四军则打到敌人后方去，在敌占区开辟与扩大抗日游击区和建立抗日根据地。在华南，广东地下党组织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已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一九三八年下半年，广东省会广州市和海南岛相继被日本军侵占，此时，雷师学校虽然照常上课，但海康县城也已遭到日机狂轰滥炸，我们学习也受到严重影响了。一九三九年一月下旬，正值学校放寒假，日机分批轰炸雷师，把宿舍和教室都炸成平地。同年三月，雷师被迫迁往遂溪古芦山村复课。与此同时，学校当局通知高师二、三年级两个班学生去高州参加军事集训，剩下高师一年级和简易师范一、二年级两个班的学生共一百多人（这时附小已办了）随校迁往古芦山村读书。该村属国民党县政府统治所在地的海康，遂溪两个县城各有二十余公里，是交通不便，而比较偏僻的农村环境，国民党政府在哪里统治比较薄弱。为我们地下党在该校学生中进行活动和发展党组织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

雷师的建党工作

一九三九年五月下旬，王文衡受到遂溪地下党的领导人黄其江同志委派去雷师学校开展学生工作，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王文衡于一九三八年下半年入党，他原是雷师高中师范班三年级的同学，一九三九年春他的班同学调去高州参加国民党的军事集训时王文衡不去高州，党组织当时调他去遂溪藤岭山村搞群众工作。在雷师读书时，他和大家一起搞过抗日宣传工作，一起参加青抗会。我们又参加他们组织的雷师学生读书会，大家在一起学习活动时间较长，他对我们比较了解，所以他回到雷师后，工作开展顺利，很快就在高师一年级学生中发展吸收唐勤、唐庆时、肖汉辉、邓其敏、丁起翥（以上五人是海康籍）、黄其炜、周济平（二人是遂溪籍）等七人填表参加中国共产党。遂溪党组织当时还另派人逐个找我们谈话后才批准入党。六月中旬，党组织又派王文衡做我们七人入党宣誓的监督员。接着又立即成立党支部，邓其敏任党支部书记，唐勤任组织委员，唐庆时任宣传委员。这是雷师学生地下党组织的第一个党支部，至今已整整五十年了。

一九三九年九月，新的学期开课，雷师学生党支部在同学中积极开展活动，宣传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英勇事迹，组织学生认真学习毛主席《论持久战》、《新阶段》等著作。传播马列主义。同年十二月，在简易班又发展吸收翁泽民、方茂盛、郑启成、陈锡庸、朱日成、

陈履祥等数人参加党组织。一九四零年，又先后分二批吸收谢鼎、黄雪霞、周立人、唐庆远、黄色伍、周德安、邱希浚、肖位才、林德等入党。到一九四零年底，雷师全校学生便有地下共产党员二十余人。党组织发展扩大后，根据遂溪党委领导的指示（当时雷师学生党支部属遂溪党委领导），各个班不另设党支部，只设立党小组，在原来党支部领导下开展活动。

遂溪县委当时对雷师党员的培养教育工作极为重视。第一批入党的七个党员，从一九四零年二月至一九四一年二月的一个时间里，就先后三次参加遂溪县委领导同志亲自主办的党员短期培训班。每次学习十余天，都是我们同班的七个党员，对外以补习学校功课作为掩护。第一期是在一九四零年二月寒假期间，地点是在遂溪县城附近的颜村仔钟贻谋同志的家中山陈华主持。主要内容是中国共产党的纲领（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党的性质、党的组织原则等。第二期是在一九四零年七、八月暑假期间，地点在遂溪平横村黄氏祖祠内，支仁山主持。内容是党的纪律和革命气节问题的教育。第三期是一九四一年二月寒假期间，地点是在广州湾太平坪边的一家农民家里，也是支仁山主持。内容是共产党员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对党要忠诚老实，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等。通过这些学习，大家提高了对党的认识，党员素质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雷师其他班的党员，当时也分期分批进行短期轮训。

同白学初斗争 我们获得了胜利

一九三九年下半年至四零年初，国民党顽固派和汉奸亲日派互相勾结，在全国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他们干出了许多为亲者痛而仇者快的恶事。雷师校长白学初也甘于充当这种角色，经常监视我们学生的行动。一九四零年四月初，我们贴出《雷师学生园地》（即墙报），其中唐庆时写了一篇文章，揭露国民党顽固派与汉奸亲日派互相勾结，屠杀抗日有功人民、破坏团结抗日的阴谋。白学初看到这篇文章后，说唐庆时受到共产党指使，搞赤化宣传活动。当天，白学初校长召开全校学生大会，宣布开除唐庆时的学籍，并贴出开除布告。事发后，全校学生极其激愤。我们班（高师二年级）即派出代表向学校当局说理，要学校收回开除唐庆时学籍的成命。几经交涉，均不见效。我们全班同学在党员的带动下，宣布罢课。党支部又发动各班党员，要他们动员与带领各班学生罢课，支援高师二年级同学的正义行动。第三天，全校学生在党支部的号召与领导下，实现全校总罢课。白学初校长看到事态不断扩大，大为震惊。他派人找我们学生代表对话，叫学生先复课，其他问题再解决。当时，我们看穿了他们的阴谋鬼计，不上他的当，并明确表示：学校是无理开除唐庆时的，要重新向学生宣布收回开除唐庆时的成命，我们才复课。学校在什么时候收回成命，我们学生什么时候就复课。学校当局看到我们态度强硬，怕事态继续发展，白学初校长答应向学生宣布撤销开除唐庆时学籍的成命，并收回贴出的布告。在这场斗争中，我们获得了胜利。校长白学初在这个学期结束时也被上面撤换了。

开展党内思想斗争 改选支委会

一九四一年一月发生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是蒋介石蓄意制造的屠杀新四军的流血事件。他明目张胆地公开破坏国共两党团结抗日，勾结汉奸亲日派准备投降日本帝国主义而掀起全国第二次反共新高潮。事变发生后，我们党中央一九四一年一月为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

充分揭露蒋介石反动集团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的罪恶阴谋。上级党组织及时把这“命令”、“谈话”和“皖南事变真相”印成大量传单于三月中旬发给我们。党支部收到这传单后，组织全体共产党员，在一夜之间分組前往太平、新圩、保安圩和在古芦山村以及学校周围附近一带村庄张贴与散发。次晨，雷师学校办公室、教室、甚至连邓时乐校长和老师的房门口、卧室以及古芦山村大街小巷到处贴满这些传单。学校当局大为惊慌，学生和村民群众议论纷纷。邓时乐是一位老奸巨滑的反共老手，国民党顽固派的忠实鹰犬，看到这些传单后，还是坐立不安。他十分注意与怀疑是一些学生搞的，布置爪牙到处打探情况，想通过各种渠道了解与抓获张贴与散发传单的人，以便邀功领赏，但他们始终查不出一线线索。那时，他也不敢乱套，因为他了解到学校附近一带圩镇村庄都贴满这些传单。

这时，全国反共逆流仍未得到制止，国民党反动派还到处逮捕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群众，实行白色恐怖。遂溪县委根据上级党委关于“积蓄力量，隐蔽精干，长期埋伏，以待时机”的指示精神，对各地一些暴露同志安排撤退转移。三月下旬，党组织通知邓其敏、唐勤、唐庆时、肖汉辉、黄其炜五人准备撤退。邓其敏传达上级党组织这个通知时，唐勤、肖汉辉、黄其炜三人表示服从党组织的决定，随时听党的调遣。而身为支部书记的邓其敏却说还有几个月就毕业了，现在撤退不是时候，表示不愿意撤退，唐庆时也是这种思想。上级党委领导同志听唐勤汇报后，指出邓其敏身为支部书记，在党调动他的时候，不带头响应党的号召，而不服从组织决定，这不是一般错误，要同他的错误思想在党内进行斗争。唐勤回来后召开我们班的党小组会，传达上级党委的指示，领导大家同邓其敏进行面对面的思想斗争，大家指出他革命关键时刻，不服从组织的决定，以个人的得失为重，把个人利益摆在党的利益之上，错误是严重的，而且是很危险的；大家还指出在唐庆时被学校无理开除学籍时，唐则垂头丧气，准备收拾行李离校回家，邓其敏身为支部书记，当时不是发动大家同白学初进行斗争，而是表现软弱无能，束手无策，他在我们的同学坚持罢课后，才参加与领导这场罢课斗争，从这件事也说明邓其敏在一些斗争关键时刻，不敢站出来领导斗争。大家对他的帮助，还是希望他能改正错误，执行党的撤退决定，但他不接受大家意见，还是表示不愿撤退，自己提出要求退党。上级领导见他坚持错误，同意他退党并要我们继续作好他的思想工作，要他退党后继续作为共产党同情者，不要出卖党，出卖革命，邓其敏也表示不出卖党不出卖同志。接着我们按照上级党委的指示改选支委会，黄其炜任党支部书记，唐勤仍任组织委员，肖汉辉任宣传委员。四月下旬遂溪县委看到当时国内政治形势比前有所缓和，又考虑到雷师高师三年级班有些党员离毕业时间只有二个月，学校当局又抓不到我们党员的活动证据，不敢随便抓人，另决定我们班四个党员暂不撤退，但要我们随时提高警惕，注意学校当局行动。七月初我们班毕业了。我们毕业之前，遂溪县委派庄梅寿来雷师接收其他班学生的党组织关系，后来雷师学校的党组织继续得到发展。

一九四一年九月初，学校新的学期开课不久，雷师校长邓时乐同他的会计兼出纳的老婆串通一起，贪污教学经费与克扣教师的工资，引起全校师生的愤怒，爆发了大规模反对邓时乐的新学潮。在这场斗争中，党组织加强了领导，使斗争不断深入，邓时乐狼狽不堪。后来由于狡猾的邓时乐勾结遂溪反动派出兵包围学校，抓走师生四十余人。事情发生后，遂溪党组织通过地方上层人士和学生家长多方设法营救，不久被捕师生才全部被保释得救。

王文劭、曾锡驹创办模范小学纪实

何 舜 琴 何 佩 均

1940年的冬末春初，北风凛冽，天寒地冻，人民群众处于饥寒交迫，水深火热之中，苦不堪言。草白、中村、六余、案首、边港、黄桐、谭坡一带村庄，素有“海康西伯利亚”之称，官商不争之地，经济、文化都非常落后。就在这么偏僻，很多人都感到陌生的情况下，却有两个热血青年出现在草白村。他们穿着朴素、大方，过巷串门，不畏辛劳，那家清贫，那家穷苦，就先到那个家里去。“关心贫苦农民”在草白，这就被视为开天辟地以来罕见的新鲜事儿。群众看在眼里，喜在心头，奔走相告，说是共产党派来“清官”，要把农民从苦海中拯救出来。严冬即将过去，春天即将到来，这两个青年给古老乡村带来了希望，送来了温暖！

这两个青年一个名叫王文劭，另一个则叫曾锡驹。他们是中共遂溪中心县委委派，经湛江“广汇行”经理何文吉介绍而特来草白、中村、六余的。他们以教书先生的身份，不仅经常出入于何金盈、何耀华等人的家里，还深入广大贫苦农民中间。经过短暂的筹划，草白村的祠堂便诞生了一所新型的学校——模范小学。这所学校不同于旧私塾，也不同于国民党统治下的一般学校。不同之处，有些人是不大了解的，这所新型学校的显著特点是：第一、学校的领导和教员是党派来的，教员被认为最有学问，最有才能的人；第二、学校的课本、教材是新编的，富有革命内容；第三、办学经费是党拨来一部分而群众捐献另一部分的；第四、教书先生不领薪水；第五、学生来者不拒，尤其欢迎贫苦农民的子女上学；第

六、学校开设文娱、体育课，教唱革命歌曲，上演革命戏，为革命开展体育活动，锻炼强健的体魄；第七、在学生中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第八、群众拥护和支持这所学校，寓革命于教育之中，教书育人。群众说：这所学校是名副其实的“模范”，模范小学的影响和作用越来越大。

模范小学是革命活动的摇篮，通过学文化，宣传革命道理，物色和培养人才，何佩瑶、何育铸、何金盈、何进文、何朝开、何学塾、何思高都是接受过王、曾培养而成长起来的革命骨干。王、曾每交待一项任务给学生，他们都要亲自检查督促，具体指导，务必落实。经过认真培养考察，1940年吸收何佩瑶、何华民入党。不久，由何佩瑶任党部支部书记。王、曾播下的革命种子开始破土而出，而且生长，开花，结果。大地不负有心人，民众也不辜负党的教育，革命的高潮便一步步地掀起来了。

以模范小学为阵地，课余王、曾深入到附近乡村，动员群众参加客仔会、酒会、理发会、读书会、姐妹会、父母会和抗日夜校等。学习内容《社会主义二十讲》、《新中国青年》、《世界大势》、《赵老太太抗日故事》、《刘胡兰》、《论持久战》。教唱《义勇军进行曲》、《游击队》、《军民合作》等歌曲。有这么一首揭露地主剥削的雷州歌：“前世没有吊你姑，一斗仔田借重租；年尾田租交不足，幸我女儿做你奴”。组织形式多样，名目各异，每个会都有会员，会长，农会就是在这个基础上逐步形成的。一切权力归农会，农民有事总要到模范小学找校长，或找会长出面评论，讲理。

当时，农、工、商各界募捐给模范小学
的经费3000多块光洋。用这笔钱购买黎
郭村祠堂30多亩田，每年可收谷9000
多斤（谷子），草白、中村三殿富有40多
亩田在杨家区安模村。由于革命急需经费，
把它变卖了，得款4000多块光洋。这钱
交由何文吉带到湛江市（现在湛一中对面处）
开办“大兴行”。该行直接从香港购进自行
车、布匹等洋货。何文吉当起该行的经理，名
曰经商，实际担当着南路至香港的通讯联系
工作，我党许多物资和军需都是从这个渠道
购进的。

当时，草白村，有位五保老人，名叫茅
园母，已八十多岁了，生病时，王同志多次
登门探望，送药，问寒问暖。病逝时，由父
母会捐钱买棺木埋葬，模范小学部分师生送
葬，王同志也参加扛棺，群众见者无不为之
感动和赞扬。共产党人是有神论者，不信
鬼，不信邪，带头破除迷信，移风易俗，共

产党人的形象在群众心目中是高大的。

王、曾既是模范小学的领导老师，又是
抗日夜校的兼职教员，工作是十分辛苦的。
根据当时形势，有些工作逐渐放手给学生骨
干去做，如草白村放手让何文吉、何金碧、
何进文去做，中村放手让何佩瑶父子、何华
民、何育铸去做，六余村放手让何思高、何
学塾去做等。当时，为了培养人材，扩大和
加强革命联系，派何舜琴、何德宏到湛江国
本小学去读书兼做革命联络工作。

革命力量不断壮大，形势对我们十分有
利，唐才猷和沈斌来模范小学观看，感到非
常满意，赞扬模范小学办得好；解放后，在
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下，这所学校越办越
好培养了大批人才。现在草白村的模范小学
校址仍在原来地方。学校面貌今非昔比，旧
地重游，感慨万千，怎么不怀念当年模范小
学的创始人王文劭、曾锡驹二位同志呢！

★ ★ ★ ★ ★ ★ ★

（上接第8页）年纪虽小，却不示弱，吵
着要参加部队，因为他个子小，领导决定让
他留下当通讯员，搞联系工作。

通过广泛的宣传发动和周密的组织，十
二个人，便有十一支枪的武装连编制就组
成了。1947年3月清明前的一天晚上，
天下着倾盆大雨，领导认为是揭竿而起的大
好时机。于是，我父亲忙碌起来了。他们
点火煮饭，杀鸡置酒；妃三披蓑戴笠，顶风
冒雨，站岗放哨；何佩瑶则召集大家开会，
表示决心。饮罢血酒，队伍就拉了出去。先
到新坑，然后到卜格、坡枚、太平、遂溪等
地，与黄鼎如部队汇合。最后改编为海康独
立营，在革命征途上留下了不平凡的脚印。

何佩瑶、何福林带领的武装连出征了，
何耀华、何妃三也跟着部队。革命使敌人害
怕，革命也引起敌人的仇视。这时，敌人凶

狠的目光已注意着我们。他们扬言要斩草除
根，铲平我家。不久敌人就疯狂清剿，一一宰
掉我家的猪和牛，扛走我家的门板和物品，
烧毁我家的粮食和田里的庄稼，逼得我们离
家出走。我母亲带着未满周岁的小弟弟白天
钻进深山密林，夜间则躲藏在亲戚家里。交
通站被破坏，联络中断了，我父亲和我的胞
弟何妃三按原来的布置，执行联络任务，不
幸被敌人诱捕，惨遭杀害。残忍的敌人把我
的亲人碎尸万段，抛弃荒草潭里。敌人抢掠
烧杀，惨无人道，使我们家破人亡，其惨状
令人目不忍视，耳不忍闻！这些亲人的遗骸
至今还下落不明，无法收殓哩。

现在，可以告慰亲人在天之灵：革命已
经胜利，烈士纪念碑上也有亲人的英名了。
安息吧，亲人；安息吧！为革命而牺牲的烈
士！

我 这 一 家

何佩瑶 何福林 何福赐 何妃勤 何佩均

在那战火纷飞的抗战时期，王文劭、曾锡驹、唐勤等同志曾深入农村，发动农民搞抗日联防，白沙区的草白、中村、六余、案首等村庄，便是他们亲自开辟的一块革命根据地。初时，先在草白村祠堂创办“模范小学”（现部分遗物还保存在村委会），王自任校长，曾任教导主任，唐任教员。他们以教书先生来掩盖革命身份。

他们在青年学生中物色革命苗子，何佩瑶何华民等人便是他们培养和吸收入党的。我的父亲何耀华出身贫苦，为人诚实可靠，他们选定我们家庭为革命交通站，还选定我们的父母亲为革命交通员。我们兄弟和村中何妃来、何妃进等人都当过交通员。

从遂溪南区到海康西区，必须经过我们这里，因而是一个中间站。周立人、邹文西、李坤山、林茂保、欧汝铎等同志就经常住、食在我们家里。半夜天寒地冻，刮风下雨，也不管路途多么遥远，多么艰险，只要领导有指示，革命有需要，我的父亲及第三胞兄都二话不说，风雨无阻地去执行任务。在白色恐怖下坚持工作，个人生命安危在所不顾。经济上，大公无私。一只腊鸭是一家穷人过春节的佳肴了，我父亲硬是要留一块款待王文劭同志。为了筹集活动经费，我父亲将卖谷、卖猪、卖蒲草得来的钱全部交给王文劭同志。当我们有困难需要资助时，王也是从衣兜里抓过一把钱交给我们。何妃三认识到国难当头，“先救国，后成家”的道理，曾将定亲的光洋亲手交给王文劭同志，买枪干革命。我父亲本来务农的，为了解和传通情报，他做过牛客、谷客、糖水客、烟客。他到过雷城、客路、太平和附近的水美、谭坡、北

村等处，联系的人很多。有人说我父亲吃了豹子胆，敢闯虎穴，实际呢，他是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

抗战初期，我们附近各村都组织抗日夜校、读书会、兄弟会、帮耕会、宣传和发动群众抗日救国。讲起办抗日夜校，我父亲十分积极，主动跨出房间。王文劭等同志十分高兴，因为群众觉悟提高了，革命已被他们所理解，受群众支持和拥护。

校舍有了，再添几张长条凳、做一块黑板，因陋就简，参加学习人员名单一公布，课本、资料一印发，夜校就正式开课了。当时学习内容有《革命杂志》、《刘胡兰的故事》、《论持久战》等书籍。这些书通俗易懂，富有教育意义。王文劭、曾锡驹等同志白天给学生上课，夜间下农村给农民上夜校的课。他们日以继夜，操劳不息，十分辛苦。我父亲每天晚上都要张灯迎送，从不间断。创办抗日夜校、组织读书会是古老乡村开天辟地的大事。先生教书不要钱，“学生”读书不出钱，共产党人空着肚皮奔波闹革命，也是盘古开天以来的新鲜事。夜晚煮着蒲糖时，端上一碗给先生充饥就算是上等慰劳品了。草白、中村、六余、案首、每条村大约有40—50人参加夜校学习，农会也就是在这基础上成立起来的。群众有事来夜校讲，请农会评理。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准备大打内战，眼看八年抗战果实有得而复失的危险。我们都希望和平，反对内战，反对内室操戈，党有指示：要做两种准备。大敌当前，我们要化整为零。当时决定王文劭转为秘密活动，隐蔽到我们家里，这样我们的任务就更艰巨

了。有一次，天下着倾盆大雨，王重任在身，执意外出。我母亲给他竹笠、蓑衣。我父亲送他一程，返回不久，王就被敌人追捕。他抄小路回来，脚底被刺伤，出了很多血。后来发炎化脓，不便行走，饭要端到床前，拉屎拉尿就更不便了。我父亲上山采药，我母亲煎药，料理了十多天才逐渐康复。最令我们担心的是王的生命安全，我们冒着生命危险彻夜不眠地轮流放哨三层来掩护他。我们决定在家里挖地洞供他隐蔽。白天，我父亲挖泥不止，夜里，又小心地把泥土挑到外面，此举不得有半点疏忽，当时没有铁锹，形势又紧急，要挖这样足够三人躲藏的地洞并不是件容易之事啊！

国民党乡兵压境，企图消灭共产党和革命力量。敌人怀疑村里有“共产党”隐蔽，只因群众觉悟高，他不敢轻举妄动，却暗地贴布告悬赏500块光洋要王文劭的首级。有一天乡兵进村搜索，狗沿路狂吠，王躲进地洞里，我母亲迅速用一口大缸盖着地洞口，还临危不惧地支开乡兵。这次脱险后，我父亲考虑到连日乡兵三番五次地来征粮饷，必有企图，生怕差错，又在塘头山头挖一个地洞把王转移到那儿。可是我们的行动也瞒不过敌人，有小股乡兵跟踪搜索，差点踩到洞口上。后来，我父亲认为此处不是久留之地，又把王领到西区倪俊山。事先约定：王扮成钓鱼翁，进山觅竹笋，跟我父亲胞兄弟“何耀宗”相称，以防万一。倪俊山树林茂密，而倪俊湾水深流急，形成三面临水的险要地势，估计王转移到这儿是没有危险的了。我父母亲为此也松了一口气。母亲做好饼干，由我父亲每天挑水过北尾湾，连同情报、衣物一起送给王。我的胞弟何纪三每天放牛在北尾湾。中午、牛牵回家马上去捕田蟹、鳊鱼，观察动静。一有情况要立即报告，竭力做到万无一失。王的母亲和弟弟王华前来探望，都十分放心，他母亲说：“俺依在这里比在家里还安全啊！”

一天，风云突变，敌人重重地包围了倪

俊山。他们搜索了大半天，终于搜出了王文劭，七手八脚地把王捆成一团，准备解送到伪乡府去。何纪三一知道，立即跑回来报告。我父亲心脏病正在发作，绞痛不已，已卧床不起多时了。可是当他听到这一消息后，顾不得病魔缠身，急忙淌水过溪，赶在半路拦救。他边跑边叫“耀宗”，王文劭心里明白，也接着应声“哥哥”。伪乡兵听了一唱一和，丈二金刚摸不着头，有点惊愕，为头的小声说：“你们真是兄弟？我父亲定睛一看，原来为头的是湖村何英道的儿子何希春。他不认识王文劭，抓住文劭后又得不到任何口供，便认为他是一个钓鱼的。况且我父亲和何希春有所认识，面文劭和我父亲年纪也比较接近。何希春仔细端详了一会，没有发现什么破绽，便信以为真，放走了“何耀宗”——王文劭同志。

我父亲营救了王文劭，心中十分高兴，他说，出家人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救共产党人一命，那就胜造千百个“七级浮屠”哟！这以后组织为了王文劭同志的安全，决定让他“西征”。我父亲认为有心送佛，应送到西天，于是他千方百计为之筹集路费。后来，又几经周折才把他送出国民党统治的白区。文劭留下的革命书籍和日本投降时所缴得的钢盔都交给我父保管，这些东西一直埋藏在我家的屋檐下，直到解放初年才全部送交给人民政府。

1947年初，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军队溃不成军，沈祺、周立人指示我们组织武装连队，迎接南下大军，解放全中国。我父亲看到黎明的曙光，积极参加组织武装连。他多次深入地主、族老的家动员他们交出枪支好给大众“巡更”。其实“巡丁”就是我们的人。我父亲在外圈做群众工作，他逢人就说：“日本仔来时气势汹汹，现在也投降了；国民党初时也气势汹汹，现在也快安蛋了。将来的世界，必定是我们的……”他的话说得群众心里热乎乎，信心十足。

我的胞弟何纪三，（下转第6页）

南渡口上 阻击残敌

黄 琦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五日，天高云淡，日暖风和，一面五星红旗，飘扬在海康县城上空，大地回春，万众腾欢，这一天，正是海康解放的好日子。

负责解放海康县城的边纵第八团胜利地完成了任务，当天便撤出县城，只留下公安同志在城里维持治安，县委主要领导忙于接管工作，县城人山人海，非常热闹，各界团体、人民，兴高彩烈敲锣打鼓，载歌载舞，手执五彩旗，列队站在南门市路口上，迎接革命队伍进城。

下午二时，肖汉辉同志率领县委，县政府工作人员及县大队（三个中队）四百多人，步伐齐整，纪律严明，精神抖擞，从扶柳村出发，步行到县城，接受了县城各界人民的热烈欢迎。

当时我是县大队第二中队指导员。这个中队负责保卫县政府，住在旧县府，正在吃晚饭的时候，忽然接到县委的紧急通知：现有国民党白崇禧所属的一股残余部队二千余人在广西被我南下大军追击，今晚可能窜来海康，企图夺路逃往海南岛。县城里所有工作同志及部队今晚都要暂时退出县城。并命令边纵第六团和县大队，在南渡河南岸阻击南逃之敌。于是六团和县大队的全体同志立即在南渡河南岸堤围上，建筑起工事，准备

迎接战斗。

第二天，这股残余部队，果然窜进县城，这时，南渡口的渡船及河里的船只，早已避开。时值黄昏，北风呼呼，毛雨绵绵，南渡两岸沉静一片。突然在距离渡口一米多远，出现十多个敌人，他们神色慌张，东张西望，估计来找渡船，观察南渡情况，敌人打了几门迫击炮，试探南渡南岸有否我军把守。我们的战士沉着应战，敌人又打了几门迫击炮，这时我们部队的机枪、步枪猛烈还击。敌人看见对岸进行阻击，便龟缩到城里去了。

敌人处在这种困难重重的关键时刻，迫不得已改变计划。第二天，这股残余部队，急急忙忙撤出县城取道沈塘区与湛江市郊的太平区一带沿海村庄去了。所到之处抓人、抢船、劫物，搞得人心惶惶，便从湛江郊区的通明港下船逃往海南岛去。

第三天，这股残兵逃之夭夭，抛下一批残马，当地群众把它送到县政府来。当天上午，我四野兵团的先鋒部队赶到县城。县政府的同志做好接待工作，接着，一批批的南下大军陆续开来，从而结束了国民党对海康的黑暗统治，使全县人民重见天日。全县人民无不感恩共产党。

吴林生平

洪元

吴林，在我国统战工作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他大革命开始直至抗日、解放战争时期都是我们的同路人；解放后，曾任海康县副县长。后来因受冤案的株连被定为反革命，判处无期徒刑，死于狱中。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经省高级人民法院复审，给予彻底平反。

吴林，一九〇三年出生于海康县（原属遂溪县）沈塘镇平余村。父亲吴育才，是满清的秀才。吴林从小随父亲念书，十六岁时进小学。小学毕业后，因家境不佳，辍学返家。一九二一年秋，到广州市就读于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在校时，与遂溪青年黄学增（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我省第二批入党的早期党员之一，大革命时期南路中共党的领导人）同窗同学，同时结识了遂溪早期共产党员韩益、陈光礼、陈荣位（后脱党）等人。由于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他倾向革命，同情劳动人民。一九二二年，因经济困难而辍学返家。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五年，经朋友介绍到北月小学当教员。

一九二五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已经进行了两年多，国民革命军开始东征，南讨、扫荡广东军阀势力，广州局势趋于稳定。吴林考进省立警官专科学校，享受公费进修。当时，广州成为革命的根据地，中共领导人源源不断地到广州来，革命思想广泛传播。吴林进一步抚摸到时代脉搏，如饥似渴地阅读了达尔文《进化论》，马克思《资本论》，孙文《三民主义》，陈独秀《新青年》、《独秀文存》，鲁迅《呐喊》、《彷徨》、郭沫若《创造月刊》等，在此时

期，吴林加入了左派国民党组织。和中共党员黄学增、韩益等关系更加密切。

一九二六年，海康农民运动发展达到高潮。雷州中共党组织为了加速培养农民运动骨干分子，在黄学增等主持下，从各乡区农会中选出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农运积极分子六十人，在雷城文昌楼办雷州农民宣传讲习所，共产党员黄学增、黄杰、杨枝水、陈荣位等在宣讲所讲课。同时，吴林爱人李剑痕（原名李少梅）作为海康的先进妇女，也参加了讲课。为雷州农民运动操劳。李剑痕是雷城人，虽不是共产党员，但当时能顶住封建势力，冲破“三从四德”的旧礼教，带动海康妇女投身革命运动，为成立雷州妇女解放协会竭尽全力，这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南路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吴林以国民党员的身份返遂溪县任国民党特派员二、三个月，曾掩护当时中共党员杨枝水、冯春若等离开雷州。后又在广州发动雷州同乡控告遂溪国民党县长林应津劣迹，受到同乡们的赞赏。

一九二九年，遂溪国民党党部改组，吴林被选为县执委。不久，因与上层人物高在湘等意见分歧，离开遂溪，在雷城北门遂二小（北门小学）任教。当时在学校读书的有他的同乡青少年黄其江、唐才猷、邓麟彰等。吴林对他们关心，给他们阅读我国古典小说，灌输爱国主义思想，鼓励他们努力学习，开阔眼界。后来黄、唐、邓等成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南路党组织的领导骨干。

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七年，吴林往广州供职，曾任广州市公安局护照处课员，广州

市新闻处检查所电讯检查员。在此期间，他接近进步人士叶启芳，结识同乡进步青年黄崇炜、王文炳（王克）。他们经常阅读鲁迅、茅盾、丁玲和高尔基的著作，对国民党的腐败无能极其不满，对苏联搞社会主义高度赞赏。他们的思想在1933年对黄其江、唐才猷等寻求革命起着推动的作用。1935年“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爆发，吴林表示极力支持，曾资助黄崇炜、王文炳等去延安。黄、王俩到延安后进抗日大学，他们在“抗大”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黄参加八路军，在华北战场上牺牲了。王克返南路，后在解放战争时期任粤桂边纵第二支队副司令员。1937年6月，吴林由国民党政府派往日本警察学校学习，后因中日战争爆发，日本当局不准入校，不久就返国了。

1938年，广州沦陷，他陪爱人李剑痕逃返雷城，任海一、雷等校教员。

1938年，黄其江等在广州江村师范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被派返遂溪组织“青抗会”，动员广大青年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发展中共党员。从此，雷州恢复了党的各级组织。当时，我党为了掌握基层政权，曾派一些中共党员打入国民党乡镇、保甲政权组织，以利于发动群众，掩护同志。1941年吴林虽在学校当教师，兼任遂溪干训所教官，与遂溪、海康的上层人物关系也比较好。我党则通过吴林的关系，推荐中共党员莫治中担任沈塘治定乡国民党乡长，管辖平余、罗家、大村等十多条村庄。1942年又通过吴林使莫治中成为沈塘大乡的副乡长兼管沈塘小学。因此沈塘大部份地区为我党所掌握，抗日武装发展得也比较快。

雷州沦陷后，吴林和爱人李剑痕入广西玉林开办医务所，李为医生，吴任合浦国民党县府助理秘书。后任合浦一中教员。

1944年，吴林夫妇返遂溪太平市开办医务所。这时在中共领导下的南路抗日武装正在蓬勃发展，唐才猷等有遂溪组织“老

马起义”的消息传开后，吴林表示关切，虽然有所担心，但他还是和黄其江接触频繁，表示愿意为我党提供敌伪情报，代购药品和子弹等。自此，黄其江派人化名“陈新”经常到太平医务所带情报，取弹药。1945年9月，国民党接管日伪政权后，国民党政府以吴林“通匪”的罪名扣押到城监狱一个多月。

解放战争时期，吴林曾任国民党海康县政府民政科长，建设科长，后到广西陆川清秀中学、湛江的湛川中学任中学教员、科长等职务。当时，他爱人李剑痕仍在太平圩、雷城镇开办医务所。而吴林返雷后和我地下党领导人黄其江、沈斌、陈质彬等联系仍很密切，平常为我游击队提供情报、药品和军事物资。因此，国民党政府曾再度以“通匪”罪名拘留吴林，逼其“声明”后释放。

1949年解放雷城前夕，我曾指派吴林和唐钦明五次和国民党海康县长陈桐谈判，教育陈桐认清形势，不与人民为敌。结果，于1949年12月5日在我游击队十八团包围雷城的形势下陈桐被迫向我投诚。

故解放战争时期曾任中共雷州地委书记、粤桂边纵第二支队政委沈斌同志回忆吴林时说：“在海康统战工作上层进展很慢，而主要靠在下层一些没有地位的小知识分子中开展。比较好的就是吴林。这个人对我们还是好的。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在龙马打仗，熬哥（即黄建涵，当时是南路抗日第一大队中队长）负伤了转回土角村，就是吴林的老婆李剑痕来医治，后来转到茂莲村，也是请李剑痕来医疗。李剑痕在那种危险的情况下给我们同志医伤，也可以看出吴林的政治态度嘛。解放前夕，我们也是靠吴林在遂溪活动，因为他与黄其江是师生关系……我们还派民主人士唐钦明和吴林做陈桐工作，结果陈桐同意投诚起义。”

解放后，吴林由中共南路地委决定任雷州师范校长。1950年12月，镇反运动中被扣留审查。1951年海康发生了骇人听闻的“六纵”假案，吴林在狱

中又被指控为“六纵”的主持人，“中统特务”而进一步受审。1953年3月，海康“六纵”假案真相大白。冤案平反后，吴林还被认定为肃反对象，延至八月才释放，释放后交群众管制一年，后又延长三年，直至1955年2月底才撤销管制，恢复工作。经中共华南分局统战部批准，任湛江市第一中学校长。1957年1月，海康县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吴林当了县人民代表。被选为海康县副县长，同时是省政协委员、中国民主同盟海康县负责人。9月，海康出现有的农民退社和某些地主反攻倒算的行动，吴林被指控为煽动这个事件的主要当事人，后划为“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判处无期徒刑，投于监狱。1960年12

月不幸病逝于怀集县劳改场第一监狱。

1984年3月15日，中共海康县委、海康县人民政府在雷州戏院召开海康各界人士追悼吴林同志大会，副县长李志荣同志致悼词时指出：“吴林同志是一位民主人士，是我党的同盟者，从四十年代到他的毕生，基本上是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和热爱祖国的。在解放战争时期，支持人民革命事业，帮助革命同志，教育妻子李剑痕秘密医治我地下伤病员多人，为解放海康，遂溪两县做过一些有益工作；解放后，为党和人民的文教卫生事业积极贡献力量，受到党和人民的赞扬。”这基本概括了吴林的为人。吴林同志安息吧！

更 正

本刊总第十期《王文弼同志生平》一文：

①第19页第19行“……；十二月，党支部吸收翁泽民、郑其成、陈锡庸、方茂盛等入党，……”与事实有出入应删去；

②同页第33行“一九四三年二月，海康被日寇占领，党组织派他化名王国柱回到海康，……。”“一九四三年”应改为一九四四年。

此外，翁泽民、郑其成、陈锡庸、方茂盛等同志系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在雷师简师班被雷师学生党支部吸收入党，与该文根本无关也应删去。

编 者

陈乔森事迹纪略

睿 深

陈乔森(1833—1905)原名桂林,字一山,因号逢山、颛山。署名所作书画,大多使用“木公”或“擎雷山农”,他原籍遂溪县的钢排村,一度迁往碓讲,同治初年才搬到雷州府城——海康县城,定居于东门之外。

少小见知三伯乐

在童年时代,他家徒四壁,生活贫苦,既没钱进学,还得四处奔波捡拾猪粪,为家庭分忧。每当路过塾馆而听见人家孩子咿咿读书,往往在拾满粪箕之后,便悄悄地站到门前或窗口旁听塾师讲评。学生心不在焉,而乔森却倾耳谛听,忘记他是一个“偷”听之“徒”。

有一次,塾师教罢,考起学生来了,学生记不清,讲不来,正皱双眉面面相觑,给塾师的戒尺就桌一拍,有的经不起突如其来的吓唬,竟“妈呀”地哭出了声。乔森忍俊不禁,不觉噗哧一声笑了起来。

“笑什么!”塾师以为是他的学生发笑,厉声吆喝,可是,当他抬起老花眼睛一看,这才发现笑声来自门外一个毛孩子。他先是一怔,继而声色俱厉地斥责:“你是谁?敢在这里放肆!”

“我。”陈乔森如梦初醒,发觉自己闯了祸,连忙毕恭毕敬地回答,“先生,我叫陈桂林,是拾猪粪的……”

“你,你……为什么发笑?”塾师不等他说完,陈乔森直言不讳地作答:“先生,您教了那么多次,我都懂了,可他们……”

“你懂?”塾师听他侃侃而谈,已感意外,见他点头示意,更为诧异,“那我来考你。”

“考就考!”初生之犊不畏虎,陈乔森把刚才塾师所教过的背得一字不差,解得一词不错。塾师惊叹不已,连忙跑到门外,又端详又抚摸,然后把他拉了进来,紧紧地握住他的双手,“孩子,你为什么不读书?今年八、九岁了吧?”

“我家穷……”陈乔森不好意思地说。“我不要你的束修”,好妈?”塾师说。“我家里还……”陈乔森心里高兴,但当他想到家道贫穷,自己要拾猪粪挣钱过活的时候,却又迟疑了,“家里有困难,我可以帮忙。”塾师象伯乐找到了好马似的,舍不得放手。

“那我告诉我妈去!”陈乔森不亦乐乎地跳了起来,三步并作两步地跑回家去了,几乎把拾猪粪的粪箕给忘了。

这以后,陈乔森就在这位塾师的门下读起书来了,这时他的年龄刚好八岁。由于他聪颖不凡,又一心向学,十三岁那年——道光二十二年,初出茅庐就考了一名“秀才”。老塾师把人家送来的“捷报”看了又看,为赏识这么一个门生而兴高彩烈,居然拿起浓茶当美酒喝起来了。

是道光末年吧,陈乔森的父亲在雷州府城做小本生意,肩挑烟丝叫卖——也有人说是在府衙当差。有一次,他从老家来城看望父亲,虽然他这时已是曾游泮水的秀才,可由于家道贫穷,衣著还是十分朴素,身上穿的是老母亲自纺自织的“东海葛”布,脚上踏的是椰棕编成的雷州网屐,真真是个土里土气,溢乎其表。在那讲究权势、财富以及门第的封建社会里,

他之不为人注意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可是，事出意料，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家住苏楼巷的海康拔贡生何凌云，对这样一位出身寒微而谈吐不俗的书生却大为惊讶，他跟陈乔森谈论经史，觉得他与众不同，于是刮目相看，待以上宾，交起好朋友来了。何凌云还逢人说项，向当时府县名流大力推荐：“东海陈桂林，乃雷州后起之秀！”他的话辗转传播，那能不引起人们的外分注目！

正是由于接触日多，视野日广，而陈乔森又孜孜好学，不耻下问，他的学识就越来越有根底了。咸丰六年（1856年），提学使殷寿彭按试雷州，看见他写的《拟潘安仁秋兴赋》一如双鹤并飞，赞叹不已；七夕招饮，又即席试以《拟柳子厚乞巧文》，洋洋数千言，挥笔立就，更为击节称赏。他认为这两篇文章词藻典雅，意境幽深，竟然出自一个年仅十余的学子之手，雷州可出了一个罕见的奇才！

过了三年，殿学使旧地重游，再次视学雷州，便选拔他与试“拔贡”。也就是这一年，他到广州参加秋闱考试，又春风得意，中试“举人”了。

这以后，陈桂林就改名陈乔森了。

羊城书肆惊书贾

咸丰十一年（1861），偶使不群的陈乔森在省城参加“乡试”期间，一有空闲便到书肆看书。有一天，书店老板见他看了大半天，一本书也没作交易，便很不客气地问他：“你是看书，还是翻书？”陈乔森遭到突如其来的“袭击”，虽感意外，还是彬彬有礼地说道：“你看呢？”店老板生气地说：“我看你既不是买书，也不是看书，是有意给我添麻烦！”

“不，不！我想买的书，在书架上找不到。”陈乔森一本正经地说。

“什么书？”店老板随便问。“《×××××》……”据说是一本比较深奥的书，不是一般学子所能懂。“给谁买的？”店老板不屑地问。“我。”陈乔森直说。“你？”店老板莞尔一笑，“哪来的？”“雷州。”陈乔森顺口作答。“雷州？哈哈！”店老板十分轻度大笑起来，似乎在说这个年青人在说谎话。

“难道雷州人就不配看这么一本书？”陈乔森给气得涨红了脸。

“是的，是的……”店老板出言不逊，“看你刚才东翻翻，西掀掀，我就看透你的底子了！”

“那你认为我不是来看书的啦？”陈乔森尽量压抑自己的内心愤怒。

“是的，是的……”店老板满不在乎。“好！这本书我刚才看过了，你可以随便考我！”

陈乔森决定给老板一点颜色看，把手上的书递给店老板。

店老板万想不到陈乔森会来这一招。起初有点愕然，但当他冷静了一下，就拿起书本翻翻，提了几次问，陈乔森一一作答。店老板目瞪口呆，不知所措，陈乔森就乘胜追击，把范围扩大到刚才所看到的书：“那些书我都看过了，你还可以拿任何一本来试试。”

“这个……”店老板骑虎难下，不过他也有这个想法：也许他手上那本刚刚看过，所以记得，这以前翻过的本本，也许……”于是，他随便拿来一本打开便问。好个陈乔森，面对店老板所有问题，对答如流，有的地方简直朗诵原文。店老板越听越窘，他给这位年青人记忆力惊住了。他想，这人只不过是这翻翻，那掀掀，竟然全书内容，以至清华所在既记得清楚，且领会得深透，实在不简单。他想到这里，这才记起自己怠慢贵客，得罪贤能，有眼不识泰山，太不应该了。于是，打拱作揖，忙赔不是，还把陈乔森请到后堂，恭恭敬敬地递烟，上茶。

这个店老板也非一般书贾，他出身儒林世家，只因秀才过后，屡试无名，便继承先辈遗业，经营书肆。这次结识陈乔森，既佩服其十行俱下，过目不忘，更敬仰他的学识广，造诣深，

打这以后，广州的书肆中人都知道雷州有个了不起的陈乔森。每当他光临书肆，搬坐的、敬茶递烟的，忙个不迭，问个不停。陈乔森也由于有了这个缘分，阅读了不少书，尤其难得一见的珍本也有机会看到，这就为他渊博学识提供了很好的方便。

大江南北数知交

陈乔森的《秋兴》、《乞巧》两赋面试之后，遐迹传诵，在五羊城下赢得“雷州才子”之称。在人文荟萃的京都，更享有无比盛名。他所寄寓的雷阳会馆，真可以说造访之人，肩摩踵接；长者之来，车水马龙。名场角逐，他吃了败仗，在以文会友这方面，却战果辉煌，结识了不少忘年的文字之交。

最早相识的是与之“同年”的晚清许振祜。

是咸丰十年吧，陈乔森乡试中式举人之后，赶到北京参加礼部主持的会试。在一次偶然的集会上，他与许振祜碰在一起，彼此一见钟情，一谈倾心，都有相见恨晚之感。

会试一过，相互交换应试情况。乔森听许振祜朗诵他在闾中写的文章后，点头称赞，认为是科必中；可是，许振祜对陈乔森的闾墨呢，说了声“好是好”之后，便默不作声，摇头叹息，似乎很不以为然。本来，陈乔森在介绍自己的文章时，认为下笔潇洒，掷地有声，即使名不高中，也不至榜上无名，愧见江东父老。可从许振祜刚才的神情看来，却不是这样，这就使他感到非常意外。许振祜说，听了你所诵文章，确是上乘之作，但当今阅卷宗师大多墨守成规，以八股为重。凡属不羁之思，超越之作，实是大忌。用苏东坡的话说吧，这样的文章很可能不合时宜，我为你担心。陈乔森听了，觉得许振祜的分析也有道理。不过，他还是寄望于一线，也许宗师不至于迂腐守旧，竟至如此！

揭晓那天，他们赶到张榜的地方。许振祜榜上题名，不出所料，而陈乔森呢，名落孙山外，不幸而为许振祜言中了。

许振祜之外，相知较深的是潘存。

潘存字孺初，海南文昌人，同治年举人，历官户部额外主事。他的诗也很有分量，在一次乡试归来而路过海康的将军驿——那时候雷琼道上的古驿，曾经写过四首《题壁》诗：

秋风零落桂花阴， 转瞬荣枯感不禁。 绿水青山千里路， 青灯黄卷十年心。
文章有时时难待， 挫折频经气亦沉。 惭愧功行诸父老， 几回侧耳听佳音。
刺船几度访神山， 弱水迴风兴转圜。 是佛何妨频劫劫， 成仙未必尽凭丹。
徒争矮屋三年苦， 欲博高堂一笑难。 廿九韶光容易老， 故人车马遍长安。
送人曾是几经秋， 鬼亦挪揄笑不休。 未信才名能折福， 岂真骨相不封侯？
青云久郁书生气， 浊酒难浇病客愁。 莫怪闻鸡频起舞， 著鞭迟逐已先刘。
连宵风雨作秋声， 撩乱征人梦不成。 摇落古今同有恨， 萧骚天地亦无情。
愁乡耿耿孤灯坐， 疲马萧萧落日行。 裘敝金闺苏季子， 须知归路少逢迎。

诗四首而字不过百余，却把举子秋闱失败的无限感慨尽情抒发，让人看到他辛酸满腹，处境难堪，有力地鞭挞了封建时代的科举制度。

陈乔森南返雷州多年，潘存还在京师当官，两地相思，诗札往来，陈乔森曾作《寄潘孺初》诗：十年留滞决归迟，车淬衣尘苦恋谁？幻戏鱼龙空百变，故巢猿鹤久相思。

东风送雨过茅屋，春水随云入棹篱。羸骥匆匆快马健，愧难来共酒醒时！

后来，潘孺初解组返乡，与陈乔森一水相隔：一在海南，一在北海。彼此相去千里，而诗歌唱和很密。孺初得子满月之日，陈乔森便为他写了《孺初得子弥月志喜》之诗：